



# 土耳其穆斯林与德国社会

敬 敬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穆斯林人口仅次于法国,达四百多万,主要是土耳其人。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断言伊斯兰文明将与西方文明为敌。很多人担心文明冲突可能会给德国带来严重后果。德国的媒体也开始不断渲染国人与“外国人”(一般指土耳其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并且把矛盾焦点对准穆斯林和穆斯林文化。但实际上,真正容易导致冲突的,是德国文化中的排外因素,尤其是对外国人公民身份进行的各种限制。而穆斯林则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融入德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 德国穆斯林移民的形成

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德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战后重建。但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盟国方面的种种限制、以及柏林墙修建阻挡了民主德国劳动力的流入等许多因素,使联邦德国面临劳动力严重紧缺的问题。随着60年代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这种劳动力供需矛盾便显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为缓解矛盾,联邦德国政府决定成立专门的劳务招募办公室,吸引外国劳动力来德务工。1962年,联邦德国与土耳其政府签订协议,规定由土耳其每年向德国提供大量劳务人员。土耳其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德劳务输出,称之为土耳其的“人口计划”,以便通过输出剩余劳动力来降低国内失业率,增加外汇储备,并通过在德国的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技术水平,培养国内亟需的工业劳动力。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土耳其人开始源源不断进入德国,数量逐年增加,终于成为德国劳动大军的一支主力。

1973年发生的国际石油危机对德国土耳其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具有深远影响。这一年阿拉伯国家联合发起针对西

方国家的石油禁运,迅速诱发了经济危机,使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受其影响,联邦德国国内就业压力骤然增大,政府签署法令,决定终止劳务输入,许多国家的劳务人员被迫离德回国,但大多数土耳其人却留了下来。这是因为经济危机同样也波及到了土耳其国内,使进入土耳其的外资减少,加上土耳其人口增长迅速,所以全国的就业压力比起德国来说还要糟糕。这些留下来的土耳其人把家属也接了过去,结果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人数量不降反增,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明显改变。不久,在德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土耳其人逐渐成长起来,数百万穆斯林长期居留德国的局面就此形成。

土耳其穆斯林进入德国以后,很快就成为德国熟练工人的骨干力量,并从事着大多数德国人所不愿干的脏活累活,比如服务员、清洁工等,为战后德国经济实现腾飞做出了卓越贡献。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德国已基本摆脱劳动力匮乏局面。但很多德国企业还是愿意继续留用土耳其工人,因为他们任劳任怨,服从管理;而且,这样可以节省培训费用,避免雇用新员工造成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和资金浪费。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土耳其穆斯林都是德国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

## 穆斯林的生活与社会地位

土耳其穆斯林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大半个世纪,但却始终无法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有很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政府对公民身份的界定和德国社会的排外心理不利于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从而导致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边缘地位,成为德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德国人一开始就称土耳其穆斯林为“外来工”(Guestworkers)。德国政府虽然迫于工会压力(工会担心降低土耳其劳动力价格会影响德国人就业),给他们和德国工人一样的待遇,可以享受福利、就业等优惠条件,但并不认为他们会长期留在德国,所以除了工作,并不关心与之有关的其他事情。第一代外来工的活动因此而受到严格限制,工厂职工宿舍和车间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范围。虽然后来他们可以在德国社会自由流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但作为移民,他们与德国人之间,还是存在一道无形的壁垒。他们中也有民族(土耳其族与库尔德族)教派(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分和语言上的差异,但在德国人看来,仍然无非是千人一面,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和德国人格格不入。特别是由于缺乏公民身份,他们在德国社会往往显得低人一等。

在德国,公民身份的确定,向来是以日耳曼民族的传统血缘为基础的。战后,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凡持有公民身份,或从1937年12月31日之前第三帝国统治区进入德国的人、具有德意志血缘的难民、配偶或儿童均是德国公民。”这一规定将德国的公民身份与德意志民族认同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外来移民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种族和文化构成越来越复杂,德国政府又在1965年通过“外国人法”,进一步对公民身份的血源性原则加以强调。1989年,东西德实现统一,前东德人和来自前苏联地区不会说德语的德意志后裔立即获得公民身份,而在德国生活了几代的土耳其穆斯林却与之无缘,这再次显示出德国公民身份血源性原则的重要意义,也使穆斯林移民感到更加孤立和不满。

不过两德统一以后,这一政策开始有所调整。1990年,德国政府重新修订“外国人法”,准许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到18岁即可获得公民身份。1999年,民法又将在德国居住的年限进一步从15年减少至8年,准许父母是外国人并在德国居住8年以上,而本人在德国出生的小孩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从而扩大了外国人的公民身份权利。但土耳其穆斯林认为,这些规定的附加条款带有歧视色彩,有对穆斯林实行文化同化的倾向,而且不利于穆斯林保持与土耳其的传统联系。他们希望在成为德国公民的同时,能继续保留土耳其国籍,但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拒绝。社会上,部分德国人尤其是右翼势力,则始终指责穆斯林破坏了德国的民族构成,威胁基督教文化,因而叫嚷着要把穆斯林从德国驱逐出去,令穆斯林处于忧惧和担心状态。迄今为止,大部分土耳其穆斯林只获得居住许可,而没有公民身份,德国文化的排外性成为他们融入德国社会的主要障碍。

因为不能享受各种公民权利,穆斯林在德国社会普遍受到排挤。政治上,他们不能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不能参与投票,也不准参加政党。他们最多只能参与地方一级参议机构的活动,但这些参议机构的所谓决议缺乏约束效力,不会影响政府决策,所以穆斯林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经济上,穆斯林也被边缘化,他们比德国人更容易遭受失业带来的痛苦和冲击。他们虽然身处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却普遍游离于社会财富之外。他们中没有稳定的中产阶级,大多数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社会生活方面,德国的住房分配和居住制度也对穆斯林十分不利。根据德国法律,任何区域的居民,只要外国人的比例超过6%,该区域就被认定为“超负荷居住区”而受到限制。德国各地方政府便以此为由,禁止土耳其人集中居住,限制“贫民窟”的发展,实际上是怕外来文化影响德国文化的主流地位。但是,德国人强烈的种族观念使穆斯林很难与之在同一社区和谐共处,穆斯林只好选择投亲靠友的方式,聚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穆斯林聚居区。像柏林的克鲁兹堡,就是德国最著名、最大的土耳其人社区,也是政府认定的人口密度过高的地区,人称“小伊斯坦布尔”。虽然这些聚居区的房屋条件和生活水平都无法与德国人社区相比,但穆斯林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寻求相互支持,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具体困难。

对穆斯林的生存及其与德国社会的关系影响最大的是教育问题。土耳其穆斯林的后代大多在德国出生和长大,但在教育方面却无法与德国社会实现顺利对接,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缺乏明显的竞争力。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贫困,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因素。在德国,政府向来对各宗教实行中立政策,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要求各级学校必须为官方认可的各宗教信众提供相应的宗教教育。德国的教会学校和其他宗教机构会因此而不断获得公共资助,国家甚至还代表教会向教民征税。但如果涉及到伊斯兰教,情况就有所不同。由于伊斯兰教不是德国法定认可的宗教,所以政府不愿意满足穆斯林学生对伊斯兰教育的特殊要求,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穆斯林自己进行解决。德国政府这样做,其实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就是担心为穆斯林学生提供宗教教育,会强化土耳其人的种族背景和宗教认同。所以,全国除了北雷恩威斯特伐利亚州和柏林以外,很少有地方政府愿意拨出专门经费,来支持公办学校的土耳其语教育和伊斯兰教教育。这极大地挫伤了穆斯林学生到德语学校就读的热情和积极性。不仅如此,为了推卸责任,德国政府还鼓励土耳其政府负责管理移民的教育事务,使移民虽然身处德国社会,却完全接受的是土耳其的国民教



育。其实,正常的宗教教育有利于穆斯林学生的社会化、培养穆斯林对德国社会的认同、拉近穆斯林与德国的距离。但德国政府避免为穆斯林提供宗教教育,却造成土耳其人与德国人之间的语言隔阂,进而造成文化的隔阂,穆斯林学生不但因为不熟悉德语而无法升入高一级教育机构,并且无法用德语与德国人进行顺利沟通,特别是不能有效地在宗教领域进行沟通和对话,伊斯兰教自然也无法发挥促使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积极作用。

### 穆斯林积极融入主流的努力

德国土耳其穆斯林虽然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但并不甘心于现状,他们一面坚持和强调伊斯兰信仰,一面又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争取获得主流社会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社会学家汉斯·皮特·瓦尔多霍夫称这是一种“文化自卫”,是穆斯林在德国社会受到孤立的情况下,以文化和宗教为基础,增强自身团结的一种主观努力。

穆斯林进行“文化自卫”的主要方式,首先就是组织和团结起来,要求伊斯兰教获得德国官方承认,享有和其他宗教一样的权利。清真寺自然成为穆斯林联合的组织基础。1980年,第一个德国穆斯林组织——柏林伊斯兰联盟成立,该联盟以团结土耳其人和所有穆斯林为己任,呼吁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1994年,“联邦德国伊斯兰理事会”成立,仿照“德国犹太人中心理事会”的模式,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积极代表穆斯林的团体利益,反映穆斯林的整体要求,努力协调各伊斯兰组织之间的关系。理事会关心宗教、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关注人权、个人利益、宗教自由和人格尊严问题,以及符合德国政府和法律规定的一些议题。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有助于穆斯林与德国人进行思想交流与对话,化解德国人的排斥心理,增进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

20世纪末,世界形势急剧变化,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德国的土耳其穆斯林也受其影响,出现一定的思想分化;有极少数穆斯林因为不满现状而变得思想激进,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大加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抵触情绪,比如称德国人为“别人”,德国为“卡非勒斯坦”(不信教者的国度)。这令德国政府十分担忧,希望能通过加强管理来遏制这种思想的蔓延。1981年,经过协商,德国与土耳其政府形成决议,规定,德国的伊玛目和教职人员只有经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批准,才能为土耳其穆斯林开展服务。全德因此有740多座清真寺受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直接控制。当然,也有许多清真寺不在此列,而是实行自治,比如隶

属于穆斯林组织“欧洲追求新世界观协会”的清真寺就有262座。尽管如此,德国政府还是认为与土耳其政府的合作巩固了德国穆斯林的团结,为其融入德国社会提供了更多可能。

清真寺在德国穆斯林的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土耳其国内相比,德国清真寺的功能是多元化的,它除了满足穆斯林的日常宗教需要外,还和当地基督教会一样,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比如为穆斯林提供福利服务,供穆斯林举办葬礼、婚礼以及进行社会集会之用。很多清真寺还开展社区服务项目,如提供清真肉食和翻译服务,举办德语和计算机培训等。正是通过与清真寺的联系,土耳其穆斯林的民族传统文化才得以延续。清真寺是德国穆斯林名副其实的社区中心和文化中心。

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独特而积极的作用,逐渐得到德国政府承认。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利用它们来加强与穆斯林的联系,整合穆斯林资源。1998年,曼海姆市政府(该市拥有德国最大的清真寺)开始启动一项计划。计划主要内容是以清真寺为中介,对穆斯林提供资助,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面临的问题。2009年12月,德国政府又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启动了伊玛目继续教育规划,以资助和举办各种学习班及培训班的方式,鼓励伊玛目们了解德国文化,学习德语,达到利用他们的影响,向广大穆斯林传播政府意图的目的。

经过长期拼搏和积累,德国穆斯林在经济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商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90年,全德土耳其穆斯林企业有33,000家。21世纪初,这一数字增加到了47,000家,共有职工20多万,大部分为土耳其人,解决了很多穆斯林的就业问题。德国的穆斯林企业向来以遵守法制而著称,一切经营行为都严格遵守政府规定。比如在培训学徒方面,81.2%的穆斯林企业都能完全达到政府的严格要求。许多穆斯林企业生产的商品,在质量方面已经超过了德国企业,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成为德国人重要的日常消费对象,为穆斯林企业挣得了良好的市场声誉,也为德国穆斯林提供了一幅美好的发展前景。穆斯林虽然大多数还没有公民身份,但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是合格的德国公民,也为他们成功融入德国社会奠定了基础。

注释:

本文为2010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课题“当代英法德三国‘穆斯林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 马锐强

